



復旦大學 美國研究中心

Fudan American Review

美国问题研究

2013/2 (总第十七辑)

| 谢 锋 |

站在新历史起点上的中美关系

| 于 滨 |

被“遗忘”的战争，还是“朝鲜战争研究疲劳症”

——评美国中学视角下的朝鲜战争

美国“再平衡”战略与对华“竞合”关系

| 吴莼思 |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战略核力量

| 张文宗 |

朝核问题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问题研究.第 17 辑/吴心伯主编.—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ISBN 978 - 7 - 208 - 12393 - 9

I . ①美… II . ①吴… III . ①美国-研究 IV .
①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3709 号

责任编辑 龚 权
封面装帧 夏 芳

美国问题研究

(第十七辑)

吴心伯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文★学★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4.75 字数 230,000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2393 - 9/D · 2511

定价 45.00 元

目 录

特 稿

- 站在新历史起点上的中美关系/1 谢 钜
被“遗忘”的战争，还是“朝鲜战争研究疲劳症”
——评美国史学视角下的朝鲜战争/7 于 滨
美国“再平衡”战略与对华“竞合”关系/25 崔立如

专题：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战略核力量/34 吴莼思
朝核问题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47 张文宗
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与全球经济治理/61 林乐芬 祝 楠

在竞争与合作中寻找平衡

- 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对华政策探析/81 杨文静
中美关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101 李 岩
美方朝核报道中隐喻、转喻互动下的权力建构/117 梁晓晖
美国外资安全审查的政治化/131 吴其胜

- 中美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比较研究：以风能为中心的考察/154 吴雁飞
未竟的争论：当代美国“政治极化”研究述评/180 徐其森

会议综述

- 第一届“美国研究全国青年论坛”学术研讨会综述/201
“转型环境中的中美关系：新的起点”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212

特 稿

站在新历史起点上的中美关系

谢 锋^{*}

大家早上好。很高兴有机会出席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与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研讨会，与各位新老朋友相聚。复旦大学和布鲁金斯学会以及在座两国各界人士长期以来为促进中美互信与合作作出了积极努力，我谨向你们致以敬意和谢意。

今天研讨会的主题是“转型环境中的中美关系：新的起点”。这很有意义。今年中美关系的确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处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

一是中美两国都进行了政府换届。3月14日，习近平主席就任国家主席当天即应约同奥巴马总统通电话。两国新的外交团队也很快建立了顺畅有效的沟通渠道，建立了良好工作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开局良好，实现平稳过渡。

二是开创了元首会晤新模式。今年6月习近平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的会晤，不仅是两国政府换届后中美元首首次面对面的接触和交谈，也是中美高层交往的一个创举。两国元首共举行了两场会谈，一场晚宴，并一起散步。双方交流的时间超过8个小时。这在中美关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过去中美元首会晤时基本是围绕双边和国际地区问题。而此次会晤双方从一开始就花了相当长时间介绍各自国内情况和执政理念。这对双方加深了解和信任大

* 谢锋，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本文系其应邀于2013年10月23日出席由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转型环境中的中美关系：新的起点”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

有助益。

会晤时，奥巴马总统赠送了习主席一把用加州红杉木做的椅子。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时曾向中方赠送了几株加州红杉树苗，并亲手种植在杭州，红杉木是四十多年来中美关系的历史见证。这也许是美方赠礼的用意。

第三，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两国元首的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最重要的成果是就中美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这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蓝图。习近平主席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三句话，精辟概括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奥巴马总统对此作出积极回应，表示中美要在互利互尊基础上探讨构建国与国新的合作模式。这是两国领导人在总结中美关系四十多年发展经验基础上，从各自国情和世情出发，共同作出的战略抉择。中美不能重蹈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老路”，而是要走出一条大国合作共赢的“新路”。

自此以来，中美双方采取积极行动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取得了“早期收获”。

——高层交往密切、沟通顺畅。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二十国集团圣彼得堡峰会期间再次举行了长达两小时的重要会晤，李克强总理与克里国务卿在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会见。汪洋副总理、杨洁篪国务委员赴美与克里国务卿、雅各布·卢财长成功举行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常万全上将、王毅外长先后成功访美。

——机制性对话取得新成果。7月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共达成创纪录的179项成果，涉及经贸、军事、科技、能源、环境、人文、地方等方方面面，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了动力。中美还建立了气候变化工作组和网络工作组，并成功举行首次会议，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经贸合作实现新突破。一个重要亮点是双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就双边投资协定（BIT）举行实质性谈判。今年6月，第九轮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在中国举行。本周，第十轮谈判正在美国举行。今年中国对美投资继续快速增长，美国已成为中国第二大直接投资目的地。

——两军关系开辟新局面。中美双方积极致力于发展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新型军事关系。不久前，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常万全、海军司令员吴胜利成功访美。今年，美军参联会主席邓普西、副防长米勒、空军参谋长威尔逊

等应邀访华。双方正按照两国元首共识，就建立两军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公海海域海空军事安全行为准则进行商谈。中美海军不久前在夏威夷进行了联合搜救演习，在亚丁湾进行了联合反海盗演练，中方还将应邀参加2014年环太平洋军演。

——对话协调，共同推动热点问题降温。中美和有关各方保持密切沟通，为防止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促使叙利亚化武问题实现“软着陆”，并推动伊朗核问题谈判出现转机。中方先后接待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领导人访华，共同推动巴以和谈。在阿富汗、南北苏丹等问题上，中美之间的沟通协调也富有成效。

同时也要看到，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没有现成经验可以照搬，任重而道远。我们认为：

一是要有信心。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四大潮流迅猛发展。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利益深度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中美同舟共济、合作共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唯一正确的选项。

二是要有诚意。中美之间的分歧不会因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而一夜之间消失。关键是双方要相互尊重，尊重彼此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尊重彼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通过对话磋商找到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的办法，不能把新型大国关系当作一个筐，一味拉单子、提条件，什么东西都往里装，更不能当成单方面评判对方的尺子，动辄拿它说事。

三是要有行动。新型大国关系不仅好听，更要管用，必须要付诸实际行动，落实在具体合作上，体现在双边关系的方方面面。双方应深化在经贸、投资、军事、人文、新能源、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务实合作，保持和加强在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叙利亚、阿富汗、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的协调合作，促成更多有影响力的合作项目，以点带面，发挥示范效应。

具体而言，下阶段，中美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第一，中美应以两国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为契机，以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为突破口，开启中美经贸合作新篇章。

中美经济体量巨大，发展阶段不同，两国之间优势互补，合作潜力巨大。

今年11月，中国共产党将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设计，提出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重点是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中国已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实验区，重点在投资准入、服务贸易领域扩大开放方面探索经验，推出了提高对外贸易便利化等措施来促进进出口。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10万亿美元商品，对外投资5000亿美元，有4亿人次中国游客出境旅游。中国欢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世界各国企业分享中国新一轮改革与发展的“红利”。

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推进BIT谈判，希望美方采取积极举措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良好的投资环境，推进中美双向投资健康发展。

美国“能源独立”战略成效显著。中方期待美方早日开放液化天然气对华出口，并在开发页岩气领域开展合作，这将有助于缩小两国贸易逆差，有助于中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有助于深化中美利益交融。美国正在积极推进基础设施更新换代。中国在该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如果美方为中国企业参与美国基建投融资合作提供便利，将为中美合作打开一片新天地。

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一直是中美贸易发展的“瓶颈”。美方多次表示将调整有关政策，但“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近来更是连楼梯都不响了。希望美方尽早采取实际行动。

第二，共同促进亚太地区的团结协作，增进互信，实现良性互动。

亚太是当今世界最富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增长源。三十多年来，这里没有大的战乱，各国享受和平，专注发展，致力于合作。中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各国都是受益者，应该倍加珍惜这一局面。

中美在亚太利益交织最密集、互动最频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从亚太做起。中美在亚太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两国都希望亚太保持和平稳定，都希望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促进地区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中美在亚太拥有不少共同的朋友，中美关系和两国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应该并行不悖。本地区大多数国家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美方也不应在中国和本地区个别国家之间选边站队。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军事同盟，不应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介入本地区的领土主权争议。

东海、南海是中国与有关国家之间的双边问题，不是也不应成为中美之间的问题。中方致力于以和平方式、通过双边友好协商解决有关争议。东方人有东方人的智慧，亚洲有亚洲的方式。希望美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在亚太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第三，推动热点问题解决，应对全球性挑战，丰富中美关系的战略内涵。

当前朝鲜半岛局势虽较前一阶段有所缓和，但仍敏感脆弱。中美及有关各方应共同敦促和引导朝方一步一步向无核化方向迈进。希望美方认真考虑设定合理对话门槛，对朝方关切作出适当回应。有关各方应共同努力为早日重启对话创造积极条件。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在叙利亚的工作推进顺利，中方愿派出专家参加相关工作。中美应共同支持、参与化学武器核查和销毁工作；推动尽早召开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推动政治解决进程。

不久前在日内瓦举行的新一轮伊朗核问题对话已涉及实质性问题，有一些积极势头。中美及有关各方应以此为契机，通过谈判缩小分歧，争取早日取得进展。同时，美国应该停止制裁中国公司的错误做法。

中方愿同美方共同推进中美援阿合作，推动阿富汗实现平稳过渡。中方明年将承办伊斯坦布尔进程第四次外长会议，希望美方支持并积极参与。

当前中东地区局勢动荡所造成的极端势力、恐怖势力、分裂势力滋长和蔓延不符合包括中美在内各方的利益。中方愿就巴以和谈等本地区的重要问题与美方加强对话协调，共同促进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

在上述热点问题上，中美拥有重要共同利益，拥有相同或相近的战略目标。但双方处理问题的思路和方式不尽相同。双方应尊重和照顾彼此利益和关切，加强协调配合，形成有效合力。

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反恐、防扩散、能源安全、粮食安全、跨国犯罪等问题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中美应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携手应对。

第四，妥善处理敏感问题，有效管控分歧和风险。

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实现重大转折，开创了和平发展新局面。但无论两岸关系如何发展，一个中国原则决不能改变。中美在台湾问题上至少有三个共同点：一是都反对“台

独”；二是都希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三是都希望和平解决。希望美方能够看到两岸关系的新变化，顺应形势的新发展，采用新思维，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支持两岸开展政治对话，停止售台武器。

此外，希望美方妥善处理涉藏、涉疆、涉港澳、人权、宗教等敏感问题，减少对两国关系的干扰。

朋友们，今年还剩下两个多月，中美之间还有不少重要议程，包括一些重要高层往来，第四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第 24 届中美商贸联委会等将先后在美国和中国举行。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离不开两国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特别是两国智库的积极参与和宝贵贡献。我很珍惜今天与大家交流的难得机会，期待着听取各位的真知灼见。

谢谢大家！

特 稿

被“遗忘”的战争，还是“朝鲜战争研究疲劳症”

——评美国史学视角下的朝鲜战争

于 滨^{*}

【内容提要】 60年来美国对朝鲜战争的反思呈两个极端：一方面是美国朝野的朝战“集体遗忘症”；另一方面则是军事史学界的“朝战研究疲劳症”。几十年来，美国朝战研究中的正统派、修正派、修正派的修正派，它们或各执一词，或相互交错，但趋势却是正统派（或修正派的修正派）渐成主流。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公众对朝战的认识仍在低水平上徘徊。这两个极化现象至今仍在影响美国朝野的对朝观念和政策。

【关键词】 朝鲜战争 正统派 修正派 现实派 意识形态派

* 于滨，美国文博大学（Wittenberg University）政治系教授，上海美国学会资深研究员，美国陆军战争学院访问教授（2013—2014）。

一、朝鲜战争的历史坐标

60 年前结束的朝鲜战争，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是一场改变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在国际层面，美苏间的冷战由此扩展至亚洲，成为一个全球性体制，几乎主导了 20 世纪后半叶的国际政治。在亚洲，朝鲜半岛的北纬 38 度线、台湾海峡和越南的北纬 17 度线，构成了割裂亚洲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三位一体”的地区架构。对中国来说，台湾与大陆的分裂不仅长久化，且成为中国在 21 世纪历史性崛起的最大不确定因素。^①然而就是这样一场战争，主要交战国（中美）不仅没有正式宣战，反而刻意“师出无名”：美国总统杜鲁门称朝鲜战争为“警察行动”（police action）；中方的百万大军则以“志愿军”名义参战。

即便如此，在恶战 3 年后，朝鲜半岛的停火线却不无讽刺地重回北纬 38 度线。进入 21 世纪，东北亚地区局势仍被 60 年前那场恶战所震撼、支配，以至于难以解脱。相比之下，20 世纪其他热战、冷战中的宿敌早已握手言和（日本也许是个例外）。^②唯独在朝鲜半岛，数百万大军仍虎视眈眈、枕戈待旦；大战虽无，摩擦不断。1953 年的一纸协定，言为停战，实为休战，亦为再战？！在这个意义上，63 年前爆发的那场“苦涩的小战争”（little bitter war），^③实为一场真正的跨世纪之战。

然而不管后人如何评说那场战争的得与失、胜与负、罪与罚，历史在 60 年

^①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牵制中国在朝的军事行动，美国也开始积极鼓动西藏上层的“独立”活动，策动达赖外逃。为此，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在 1951 年还制定了把达赖“绑架”到印度的计划。参见 Kenneth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2), pp.11—17。

^② 参见笔者 200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60 周年发表于英文《亚洲时报》的《纪念日之挽歌》，Yu Bin, “The Anniversary Elegy,” *Asia Times*, August 16, 2005,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GH16Ad07.html>。

^③ 参见 Joseph C. Goulden, *Korea: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War*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82), p.XV。此书 1990 年由解放军出版社翻译出版：《朝鲜：未透露的战争》（于滨、谈锋、蒋伟民译），修订版即将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美国军事史学家 S.L.A. 马歇尔认为朝鲜战争是“本世纪糟糕透顶的小战争”（The century's nastiest little war）。参见 David Halberstam, *The Coldest Winter: 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 (Hyperion, 2007), p.1。

前中美朝（韩国除外）签订停战协定时已经改写：它是美国开国以来第一次战而无胜之役，也是中国自鸦片战争百余年来境外战争中首次不败纪录。中国志愿军将士以简陋的装备、顽强的意志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应对拥有陆海空绝对技术优势的对手，硬是把逼近鸭绿江边的 16 国联军一度推回北纬 37 度线。朝鲜战争的结局，是年轻共和国的开拓之举，也是我们多难民族历史性崛起的第一步，更作为东北亚地缘政治的拐点而载入史册。

二、美国的“集体遗忘”与“不依不饶”

60 年来，美国朝野对待朝鲜战争的观念可用“集体遗忘症”（national amnesia）来概括。美国出版界有关越南战争的出版物汗牛充栋，而关于朝鲜战争的书籍却寥寥无几，其中又多以“遗忘”（forgotten）、“未透露”（untold）等为主题。^①著名作家戴维·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1972 年以揭露越南战争决策失误的《出类拔萃之辈》^②一举成名；而他关于美国陆战第 1 师在长津湖侥幸逃脱中方第 9 兵团毁灭性打击的巨著《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③，直到他 2007 年去世数月后才出版。出版界失语，好莱坞亦健忘。美国大小银幕上充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的镜头，唯独关于朝鲜战争的作品凤毛麟角。甚至首都华盛顿的朝鲜战争雕塑群，也是在停战 42 年之后的 1995 年落成，比建于 1982 年的越南战争纪念墙还晚 12 年，而后者在越南战争结束 7 年后即完工。直至 2009 年底，美国国会才通过法案纪念朝鲜战争。对此，美国甚至有人称朝鲜战争是美国现代史的“黑洞”（the black hole of American modern history）。^④

^① 近期著述参见 Blair, *The Clay Forgotten War: America in Korea 1950—1953*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3); James Wheaton, *The Forgotten War: A Brief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12); Joseph C. Goulden, *Korea: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War*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82)。

^② David Halberstam, *The Best and Brightest* (Ballantine Books, 1972).

^③ David Halberstam, *The Coldest Winter: 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 (Hyperion, 2007).此书于 2010 年由重庆出版社翻译出版（王祖宁、刘寅龙译）。

^④ 参见 David Halberstam, *The Coldest Winter: America and the Korean War* (Hyperion, 2007) 精装本的封套。

美国多年来对朝鲜战争集体失忆，有出版界自身的问题。其中不乏那些良莠不齐的“野史作家”，其中绝大多数不求甚解，东拼西凑，甚至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而“编故事”；而且是写了就忘，忘了再写。^①即便是一些出自名家之手、迎合大众口味的著述，对历史事实的追述亦有待深入和公正。2007年出版的《最寒冷的冬天》一书，虽源自著名政论家和作家哈伯斯塔姆，但他把美军在朝鲜战争初期的一系列战略和战术错误，似归咎于妄自尊大、我行我素的麦克阿瑟；而千里之外的文职高官们则更像是麦克阿瑟主义的“受害者”。杜鲁门作为三军统帅，在生与死、成与败的兵家大事上，对桀骜不驯的战区司令唯唯诺诺、无所作为，至少有渎职之嫌。

但在笔者看来，美国朝野对朝鲜战争“健忘”，还有心理和政治上的原因。首先，美国历史上对外战争颇多。3年朝鲜战争，长度不及越南战争的三分之一，辉煌不及数月的海湾战争。处于不赢不输的灰色地带的朝鲜战争，在国民记忆中自然难有其位。其次，美国政府大事化小，当初把朝鲜战争定义为“警察行动”，以绕过国会审理、宣战的“麻烦”（无独有偶，“9·11”事件后美国把本应是“警察行动”的反恐定性为“战争”，以无限扩大总统操控战争的权力，美国立法系统对行政部门在对外政策上的制约荡然无存）。然而越南战争也被定义为“警察行动”，美国人何以念念不忘？！

朝鲜战争在美国国民记忆中的“边缘化”，似有更深层的原因。美国政治文化的宗教色彩极浓，习惯于在敌我、黑白、是非、善恶、胜败中选择其一，不输不赢的朝鲜停战实属另类；它既不同于此前美国完胜对手、重塑国际体系的两次世界大战的伟绩，也有别于美军筋疲力尽、被迫撤出后彻底失败的越南战争。这也就是为何美国对朝鲜战争的观念，多年来一直游离于两个极端之间：既要“遗忘”，却又难以割舍；既要千方百计地从记忆中抹除，也为当年不能“临门一脚”而耿耿于怀，难以放弃与朝鲜现政权敌对的政策。2010年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时，美国总统奥巴马突然宣称美国赢得了朝鲜战争，并且不接受“平局”的说法。^②然而不管

^① 参见 Allan Millett, “Remembering the Forgotten War: Anglo-American Scholarship on the Korean Conflict,”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Korea Branch, Vol.70, 1995, pp.53—70。

^② 奥巴马原话为：“This was no tie. This was a victory. It was a victory then, and it is a victory today”。参见 Peter Maer, “Obama Calls Korean War a ‘Victory,’ Hails Veterans,” CBS News, November 10, 2010, http://www.cbsnews.com/8301-503544_162-20022466-503544.html。

奥巴马是为了哗众取宠还是安抚人心，这位哈佛的高材生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在朝鲜战争的结局的认知方面，既违反历史，也无视现实。按美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拉夫伯（Walter LaFeber）的话说：“美国人常抱怨说，美国总是赢得战争但却失去和平，这两个说法其实都不甚准确。事实上，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被迫接受的僵局，而在十年后开始的越南战争中，美国的败局更是确凿无疑。”^①

19世纪以来，美国外交其实是在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的两个极端中摇摆。要美国与一个善恶同在、不黑不白的灰色世界共存，几乎不可能。“9·11”事件以后“要么支持，要么反对”（be with us or against us）美国的小布什主义，就是最好的佐证。美国至今对朝鲜不依不饶，对朝政策仍停留在敌视和制裁的过去时态，不仅仅是由于朝方的僵硬政策，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极端宗教化和意识形态化，也是原因之一。小布什上台伊始，就给金大中的“阳光政策”泼冷水，先给朝鲜扣上“混蛋国家”的帽子，“9·11”事件后又把朝鲜划入“邪恶轴心国”（axis of evil）之列。奥巴马上任后，一改小布什政府执政最后两年积极接触朝鲜的政策，将美国对朝政策定位于所谓“战略耐心”（strategic patience），即对朝鲜采取少接触、不谈判的“有所不为”的政策。^②国务卿希拉里更是带头支持甚至纵容日本以所谓“绑架”问题，干扰和迟滞六方会谈，为日本右翼修宪和扩军制造借口和空间，直接或间接地激化南北对立，极大地干扰了半岛的稳定。^③“天安号事件”、“延坪岛炮击事件”、金正恩执政后的战争边缘政策，都

^①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2006*, updated 10th ed. (McGraw-Hill, 2008), p.ix.

^② 参见 Matt Spetalnick and Anna Yukhananov, “Analysis: North Korea tests Obama’s ‘strategic patience’,” Reuters, April 9, 2013,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04/09/us-korea-north-obama-idUSBRE9380YR20130409>。

^③ 2009年2月初，新任国务卿希拉里在给日本外相中曾根弘文的电话中，声称她将“重视绑架问题，理解日本人民的心情”。希拉里的外交表态，抛弃了小布什政府2006年以来搁置绑架问题，直接与朝鲜对话的政策。而小布什的现实主义政策，对当时已经被所谓“绑架问题”绑架了的日本舆论和对朝政策造成强力冲击，也是2007年第六论会谈取得突破的关键。奥巴马就任后，日本国内被压抑多年的务实派，也祈盼奥巴马政府能够对日本保守派继续施以外部压力，以期改变日本保守派对绑架问题不依不饶、使朝鲜“威胁”常态化的企图。而希拉里的表态，对日本的鹰派无疑是雪中送炭，日本对朝政策因此更趋强硬。参见 Ayako Doi, “What Hillary Should Tell Japan,” PacNet Newsletter, No.8, February 4, 2009, <http://csis.org/files/media/csis/pubs/pac0908.pdf>。

与美国扭曲的对朝观念不无干系。

三、以史为鉴，美国 Style?

其实美国朝野对朝鲜战争的“遗忘”，还只是一个表面现象。美国学界对朝鲜战争的态度则是另一番景象。美国史学界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大规模”反思朝鲜战争，且一发而不可收。时至今日，美国朝鲜战争研究中的正统派、修正派、修正派的修正派，^①对朝鲜战争的根源、过程和结果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各种论点层出不穷，以致美国朝鲜战争史学家艾伦·梅莱（Allan Millett）在 2010 年宣称，对这场“被遗忘的战争”的“追记”已经“绰绰有余”，不再费时费力了。^②对此，笔者称之为“朝鲜战争研究疲劳症”（fatigue）。^③

美国军事史学界对朝鲜战争的“百花齐放”和“过度反思”，与美国国民对朝鲜战争的“集体遗忘”，似成巨大反差。个中原因仍是不解之谜，美国国民意识中对于 60 年前结束的那场战争仍近乎白纸一张。然而真正主导美国对朝政策的是精英阶层，美国军事史学界对朝鲜战争的反思，仍是中国同行需要关注的重点。

美国史学界对朝鲜战争的研究中众多流派进行梳理的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是把批评美国的观点和著作统统打入所谓“历史修正派”（historical revisionism）。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1981 年的《朝鲜战争

① 有关西方学界对朝鲜战争研究的评介，参见 Allan R. Millett, “Bibliographic Essay,” in Millett, *The War for Korea, 1950—1951: They Came from the North*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0), pp.577—610; “The Korean War: A 50-year Critical Historiography,”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4:1 (2001): pp.188—224; “Review Essay: A Reader’s Guide to the Korean War,”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1 (July 1997), pp.583—597; Rosemary Foot, “Making Know the Unknown War: Policy Analysi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in the Last Decade,” *Diplomatic History*, 15 (Summer, 1991), pp.411—431; William Stueck, “The Korean War as International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10 (Fall, 1986), 291—309; Judith Munro-Leighton, “A Postrevisionist Scrutiny of America’s Role in the Cold War in Asia, 1945—1950,”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1 (Spring, 1992), pp.73—98.

② 参见 Allan R. Millett, *The War for Korea, 1950—1951*, p.608.

③ Yu Bin, “Chinese People’s Volunteers—Tactics, Equipment and Logistics,” in James Matray and Donald Boose Jr., eds.,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the Korean War* (UK.: Ashgate Publishing Ltd., forthcoming 2014).

之根源（第一卷）：朝鲜光复及两个政权的形成，1945—1947年》^①，对美国官方关于朝鲜战争根源的解说提出质疑，认为美军对朝鲜南部占领期间，支持和扶植日本殖民统治期间的伪政府和军警系统人士，由此引发的1948年的朝鲜南部的大规模反叛和残酷镇压，是导致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的主要根源之一。卡明斯在这部在美国颇有争议的“历史修正派”著作的第一卷只写到1947年，涉及朝鲜战争正式爆发（1950年6月25日）的第二卷直到1990年才完成。^②此间，卡明斯作为第二作者，与乔恩·哈利迪（Jon Halliday）出版了《不为人知的战争：朝鲜》。^③与此同时，约翰·梅里尔（John Merrill）的《朝鲜半岛的战争根源》也加入了“修正学派”的阵营。^④上述几本著作，奠定了美国研究朝鲜战争的“修正派”的基石。其实，美国史学界对朝鲜战争的反思一直都未中断。甚至在朝鲜战争仍在进行期间，美国作家斯通（I.F.Stone）就发表了著名的《朝鲜战争幕后史：1950—1951年》^⑤。费伦巴赫尔（T.R.Fehrenbach）1963年出版的《如此战争：美国措手不及》^⑥，以及贝文·亚历山大（Bevan Alexander）1986年出版的《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⑦，主要从军事角度对美军的战时运作提出尖锐批评。然而上述修正派著作的力度均不及卡明斯的“三板斧”。

在一定程度上，美国朝鲜战争“修正派”并非是一个突发和孤立的现象，美国史学界有人将冷战期间的整个美国外交史学界打上“修正派”的印记，原因是这些学界人士多为自由派和左派人士，鲜有从军参政的经历，对军事战略

^① Bruce 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Volume I: Liber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Separate Regimes, 1945—1947*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② Bruce 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Volume II: The Roaring of the Cataract, 1947—195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③ Jon Halliday and Bruce Cumings, *The Unknown War: Korea* (New York: Pantheon, 1988).

^④ John Merrill, *Korea: The Peninsular Origins of the War*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89).

^⑤ I.F. Stone,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Korean War, 1950—1951* (Boston: Little Brown, 1952).此书1989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

^⑥ T.R. Fehrenbach, *This Kind of War: A Study of Unpreparedness* (New York: Macmillan, 1963).

^⑦ Bevan Alexander, *Korea: The First War We Lost* (New York: Hippocrene, 1986).此书由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翻译出版。

战术知之不多，因此对战争、军界和军事事务有本能性的抵制。^①其中包括卡明斯和梅里尔的导师格雷戈里·亨德森（Gregory Henderson）。^②

“修正派”的对立面当然是正统学派（orthodox school），其主要代表作有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1967年出版的《共产党中国的军队：朝鲜战争及其后果》^③，罗伊·阿普尔曼（Roy Appleman）1990年出版的《朝鲜的灾难：中国人挑战麦克阿瑟》^④，克雷·布莱尔1987年出版的（Clay Blair）的《忘却的战争：美国在朝鲜，1950—1953》^⑤，马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1987年出版的《朝鲜战争》^⑥，艾伦·梅莱2010年出版的《为朝鲜而战：1950—1951年，战争来自北方》^⑦，以及威廉·斯迪克（William Stueck）1995年出版的《朝鲜战争的国际视角》^⑧。贯穿这些正统派著述的一条主线就是维护美国参加朝鲜战争的必要性、正当性，直接或间接地回应修正派早期对美国战争政策的批评；与之并行不悖的是，一些面向公众的通俗读本，也致力于描述朝鲜战争中美军“被遗忘的”战绩，尤其是二次战役期间美国陆战第1师在东线的“有条不紊的”撤退，著名政论作家哈伯斯塔姆去世前完成的《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一书就属此例。^⑨

美国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相当部分著述是针对具体军事议题的“专业”研

^① Allan Millett, “Remembering the Forgotten War: Anglo-American Scholarship on the Korean Conflict,” pp.55—59.

^② Gregory Henderson, *Korea: The Politics of the Vortex*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③ Alexander George,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in Action: The Korean War and Its Afterma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④ Roy E. Appleman, *Disaster in Korea: The Chinese Confront MacArthur*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⑤ Clay Blair, *The Forgotten War: America in Korea, 1950—1953* (New York: Times Books, 1987).

^⑥ Max Hastings, *The Korean War* (Simon & Schuster, 1987).

^⑦ Allan Millett, *The War for Korea, 1950—1951, They Came From the North*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10). 此书正在被国内一家出版社翻译，该书的第二卷也将在年内问世。

^⑧ William Stueck, *The Korean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⑨ 2004年10月7日，哈伯斯塔姆在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采访笔者，其中尤为关注中方对美军尤其是海军陆战队作战能力的印象和评估。